



## “新气象”辨正——与张立文先生商榷(李存山)

(2005-7-13 10:24:54)

作者：李存山

近日偶读张立文先生的文章《东亚意识与和合精神》(载《学术月刊》1998年第1期)，觉其中虽然有些正确的见解，但立论偏失、不严谨之处亦有不少，而在讲到“如何解决自近代到本世纪80年代关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论争”、“如何‘转生’中华文化”时，对“综合创新”、“新气象”等等的论述、评价尤为主观随意，在贬损了诸种他说之后作者对其自己所标榜的“和合学”却褒扬过甚。为维护学术研究的客观公正性，笔者不揣浅陋，在此主要就“新气象”并兼及其他问题作一辨正，以与张立文先生商榷。

关于“新气象”，《东亚意识与和合精神》(以下简称张文)是将其置于“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”中，与宋明理学和现代新理学、新心学联系在一起讲的。按照张文的理解，中华文化的“正常”的发展进程是：“每一次从死亡到转生，大体上是300多年到500年间。譬如从孔子建立儒家学派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建构新儒学及两汉经学，约经400来年；从董仲舒到魏晋玄学的建构，约经300多年；从魏晋玄学到唐代儒、释、道三教之学，约近400年；从唐代玄奘、窥基、法藏、慧能等佛学大师到宋代的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等理学家的出现，亦近400年。”在这一“正常”的进程之后，出现了“特殊”，即“唯独宋明理学讲了近1000年，一直延续到现在”。于是，张文发问：“究竟要讲到什么时候为止？讲到什么时候算一站？”在此两问之后，张文说：“宋明理学中的程(颢、颐)朱(熹)‘理学’，由冯友兰的‘新理学’接着讲；陆(九渊)王(阳明)‘心学’，由梁漱溟、熊十力、唐君毅、牟宗三等‘新心学’接着讲；张(载)王(夫之)的气学，由张岱年和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学人接着讲。由程朱、陆王、张王的‘旧三学’一直讲到现代‘新三学’，即现代新儒学，究竟有何意义？有何价值？”张文对所谓“新三学”的“意义”、“价值”没有作正面解答，给人以“新三学”——“究竟”——无意义、无价值的印象，而其接着说的一段话可算是作者的一个间接解答：“宋明新儒学的理学、心学、气学延续到现代，现代新儒家便吸收西方哲学中的新实在论、黑格尔、康德、斯宾诺莎、怀德海哲学，对‘旧三学’作了新的解释，从而开出新理学、新心学、新气象，但就其思维模式来说，都还属于道德形上学本体论的传统，仅就此而言，现代新儒学的‘新三学’并没有超越宋明新儒学的‘旧三学’。”

纵观以上论述和评价，其粗疏和主观随意是令我感到惊讶的。

首先，张文用“从死亡到转生”来表述中华文化的辩证发展过程，是用词欠妥的。因为，譬如从先秦儒学发展到两汉经学，我们不能说先秦儒学就已“死亡”了，相反，先秦儒学仍然是两汉经学之后儒学发展的源头活水；从唐代唯识、华严和禅宗的几位佛学大师的思想发展到宋代理学家的思想，我们不能说后者是前者“死亡”之后的“转生”，而可说后者吸取了前者的一些思想因素(此外还有其他重要的思想渊源)，前者的思想也并非一到宋代就“死亡”了。张文说：“每一次从死亡到转生，大体上是300多年到500年间”，从其后所举的例证看，作者的本意似是从一种重要的思想建构到另一种重要的思想建构“大体上是300多年到500年间”，而并非“从死亡到转生”是如此的频率。因为，“譬如从孔子建立儒家学派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建构新儒学及两汉经学”，这里的“孔子建立儒家学派”正是儒家学派的兴起，而并非儒家学派的“死亡”。另外，作者将董仲舒建构的“新儒学”与“两汉经学”并列，这也是不严谨或没有交待清楚作者自己所理解的新意的。类似于这样的不严谨，本文姑且不作详论。

其二，张文之所以先讲一段“从死亡到转生，大体上是300多年到500年间”，目的是要引出“唯独宋明理学讲了近1000年，一直延续到现在”的不正常，故有“究竟要讲到什么时候为止？讲到什么时候算一站？”的发问。实际上，对于“宋明理学讲了近1000年”是应该有些分析的，宋明理学发展到明清之际已经告一段落，其后虽然清廷的正统意识形态仍然讲宋明理学，但广大士人的学术思想主潮已经是经世致用的“实学”和复兴后的“汉学”或乾嘉考据

之学，到了晚清则是新兴的公羊家之学。如果说“讲了近1000年”是以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延续为准，那么晚清鼎革之后的所谓“一直延续到现在”显然又是使用了另一种标准。作者问：“究竟要讲到什么时候为止？讲到什么时候算一站？”这种发问是很不严肃的，因为哲学或文化思想的发展是被社会历史的进程所决定的，作者不去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进程，而空发此问，其根据不过是所谓“从死亡到转生，大体上是300多年到500年间”的生死“轮回”周期。按照此周期，作者的本意似是说，从周敦颐、张载、二程之后最多经历500年，也就是到明代中期（王阳明心学刚刚产生，王夫之气学尚远未出世的时候），宋明理学就应该死亡、终止、到一站了；而其没有死亡、终止、到一站，作者认为是“唯独”的不正常。实际上，作者据哲学或文化思想的生死“轮回”周期而发问，这才是不正常，而且是悖理的！

其三，张文把宋明理学期长期发展、“一直延续到现在”的不正常主要归于程朱、陆王和张王的“旧三学”被现代哲学史上的“新三学”接着讲。这里，所谓“现代‘新三学’，即现代新儒学”能否被纳入宋明理学的范畴？能否说“现代新儒学”的“意义”、“价值”只是“现代新儒家”吸取了西方哲学的某些思想，“对‘旧三学’作了新的解释……但就其思维模式来说……并没有超越宋明新儒学的‘旧三学’”？特别是，所谓“由张岱年和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学人接着讲”的“新气学”能否称为“现代新儒学”？能否说成是“宋明理学”在现代的延续？其思维方式是否“属于道德形上学本体论的传统”而没有超越张（载）王（夫之）的“旧气学”？

关于现代新儒学，我国近些年已有一批学者对其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，这种研究的范围包括了现代的新理学和新心学。新理学和新心学能否被纳入宋明理学的范畴？是否“接着讲”或“旧瓶装新酒”就可以说是宋明理学“一直延续到现在”？其“意义”、“价值”，或其思维模式，是否“没有超越”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？我想，这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者已有许多成果面世，对这样的问题自会有公论。

无论我国国内还是海外的新儒学研究者，都没有把“由张岱年和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学人接着讲”的哲学纳入“现代新儒学”研究的范围。据我所知，可能唯独张文的作者称此为“现代新儒学”，把“张岱年和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学人”称为“现代新儒家”。张文的作者无疑也是“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学人”之一，我不知，张文的作者是否承认自己是或曾经是“现代新儒家”？

张文把所谓“新气学”纳入“现代新儒学”和“宋明理学”的范畴，这是本文以下所要重点进行辨正的。

## 二

关于“气学”和“新气学”的名称，据我所知，张岱年先生本人未曾使用过。

在张岱年先生早年所作的《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》一文中，张先生说：“宋以后哲学中，唯物论表现为唯气论……唯气论其实即是唯物论……”[①]在《中国哲学大纲》中，张先生说：“在中国哲学中，注重物质，以物的范畴解说一切之本根论，乃是气论。”[②]张先生晚年较多使用的是“气一元论或气本论”[③]概言之，唯气论、气论、气一元论或气本论，名称虽异，涵意是相同的。冯友兰先生在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中提出：“心学和理学是传统的名词，如果以这两个名词为例，立一个新名词，那就可以说张载的一派是气学。心学和理学是道学中的唯心主义，气学是道学中的唯物主义。”[④]葛荣晋先生著有《王廷相与明代气学》一书（中华书局1990年版），张岱年先生曾为之作“序”，在“序”中称张载的思想为“气一元论”，但对“气学”一词亦未提出异议。据此可以说，张先生本人虽然未曾使用“气学”一词，但对这一名称也是比较首肯的。

“新气学”的名称，我以前没有听别人讲过，张先生本人更未曾使用过。不过，我在1995年曾参加过一次题为“马克思主义与儒学”的学术讨论会，在会上我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，这次发言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一篇短文，即《破除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“夷夏之辨”》（载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》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），我在此文中探讨性地使用了“新气学”的称谓：

[第 1 页]      [第 2 页]      [第 3 页]

[关闭窗口]